

劫后影谈

夏衍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劫后影谈



劫后影谈

夏衍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北京

内 容 说 明

《劫后影谈》是夏衍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有关电影方面的讲话、文章的辑集。作者以从事电影工作多年的深切感受，总结了我国电影事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了精当的见解和殷切的期望。观点鲜明，实事求是，发人深思。书中还收入了作者与专业、业余电影创作人员的通信、谈话五篇，语重心长，亲切感人。是一本值得向电影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推荐的好书。

劫 后 影 谈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frac{1}{2}$ 插页：3 字数：134,000

1980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册

(内纸精本 1,900册)

统一书号：8061·1542 定价：(平) 0.82 元



作者近影

目 次

新春答客问	(1)
——答《人民电影》编者的提问	
生活 知识 技巧	(9)
——在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定要提高电影艺术的质量	(20)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41)
——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将来	
在电影界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	(50)
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的讲话	(55)
在科教电影事业规划会议上的讲话	(80)
培养电影创作干部是当务之急	(89)
在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	(92)
祝愿与期望	(109)
历史的回顾	(112)
——在文学艺术研究院的讲话	
第二次在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	(119)
我的期望	(136)
——在中国剧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44)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159)

在中国“世界电影学会”上的讲话	(167)
给《梅岭星火》作者的信	(176)
对于《柳暗花明》的几点意见	(178)
附：陈登科等给作者的来信	
多读书 勤练笔	(185)
解放思想 勤学苦练	(189)
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197)

新春 答 客 问

——答《人民电影》· 编者的提问

问：在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请你谈谈对当前电影工作的看法和想法。

答：我和电影界隔绝了多年，对具体情况知道的很少，在去冬的两次座谈会上，和一些电影界朋友谈起，我觉得在整个文艺领域中，电影界是受“四人帮”摧残破坏得最严重的“重灾区”。要整顿、恢复、发展，得花相当的时间和很大的努力。今年，是三年大见成效的关键的一年，而明年，一九七九年，正好是建国三十周年，在这时候，如果还不能生产出一定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影片，人民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在春节前夕，我希望所有的电影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党中央周围，把千仇万恨集注在“四人帮”及其余党身上，团结奋斗，摄制出更多更好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作为建国三十周年的献礼。

问：你认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 《人民电影》一九七六年三月创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停刊。

答：抓纲治电影的根本问题，还是深揭狠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要多拍好影片，首先要扫除“四人帮”在电影事业方面设置的各种障碍，要整顿组织，恢复合理而必要的规章制度，肃清各个生产环节中还严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解除艺术创作人员的精神枷锁。单就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解放创作人员的精神枷锁这一点来说，我以为首要的问题要大力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队伍。在电影艺术方面，我们这支队伍过去就不够强大。就我自己来说，正由于自己没有认真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左右摇摆，就不能有力地抗拒从国内外刮来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歪风，就不能坚持和贯彻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我深切地感到，在过去，“四人帮”可以在文艺界——电影界猖獗一时，主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对各种反动思潮缺乏抵抗力，所以在今后，更应该认真地、准确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理论队伍，在创作上也要有这样一支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能清除，创作人员的思想不能解放。

问：你看，今后一两年内，电影事业的前景如何？

答：我认为，要在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生产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最紧迫的问题是数量和质量。我的想法可能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按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这里说的是故事片——包括全国各电影厂的设备能力、创作人员和后勤力量，每年可

以生产一百到一百二十部故事片（这个目标在以前就没有完成过）。年产一百部左右，那么每三天群众就可以看到一部新的故事片。过去，年产五六十部，是完全有把握的，这就是说，每一星期可以让观众看一部新的故事片。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之后，看来要达到“每星期出一部新片”的指标，也得花很大的气力了。至于质量问题，那就更严重了。因为电影的主要生产力，编剧、导演、演员、摄影……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最近，有几位年老多病的导演和我谈，打倒了“四人帮”，“拼老命”也得拍出几部好影片出来。这话使我很感动。但是，导演不仅是脑力劳动加体力劳动，而且还要跋山涉水，长期地进行野外作业，把希望单寄托在“老”一辈身上是不行的，必须用传、帮、带的办法，提高“中”、“青”这一代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最近我从电视中看了一部“青”一辈的——电影学院毕业生的作品，也听到不少非文艺界的观众和干部对这部影片的尖锐的批评，就深为这一辈的业务水平感到担心，因为他们毕业之后，正碰上了“四人帮”控制电影最严酷的时刻。讲到编剧，问题也不少，除了青黄不接之外，还有一个深入生活和熟悉生活的问题。讲得具体一点，就是深入和熟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人新事的问题。我们现有的编剧，大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这个时期的题材比较熟悉，比较有实践经验，比较有感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对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特别是对电子时代的尖端工业，就比较不了解，不熟悉，也许可以说知道得太少了。因此，要编写和摄制这些题材的作品，困难就更大了。这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了。在题材问题上，在党中央督促

下，我们过去也曾有过所谓“五、三、一、一”或者“四、四、一、一”的设想和试验，就是说，希望能在故事片的年度生产中，做到现代题材——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题材占百分之五十或四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占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占百分之十，古代及其他题材占百分之十，但是，其结果，常常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题材的作品膨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题材的作品完不成计划或完成得不好。甚至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硬性规定，每个厂每年最少要有两部以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农业为题材的作品，也还完成不了任务。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一九七九年已经迫在眉睫了，华主席、党中央号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在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机械化，要尽快地在科学技术方面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假若在三十周年国庆献礼片中反映这方面题材的作品不占优势，没有一批反映这些题材的优秀作品，是不行的。当然，时间已经紧迫了，我希望我们的编剧、导演迅速行动起来，也还应该和小说、戏剧作家合作，写出或者挑选出一些这方面题材的小说、戏剧、报告文学，作为改编电影剧本的基础。

问：题材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答：题材问题不单是一个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要求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就有过痛苦的经验，有过犯错误的经验，放任自流是不行的，不热情鼓励，不给作家以必要的条件，写出作品

来又给予轻率的否定，更是不允许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有计划、有措施地组织作家全心全意地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培养出一批熟悉这方面生活，对这方面的新人新事有感情的编剧、导演，这是关系到我国电影事业前景的根本性的问题。从电影题材——题材比例，我联想到毛主席对农业生产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对这里所说的“全面”，又具体地提出了十二个字，即：粮、棉、油、茶、丝、麻、糖、菜、烟、果、药、杂。毛主席还强调：“一定要把粮食抓紧，一定要把棉花抓紧。”因此，我想在电影题材问题上，是不是也可以提：“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题材为纲，全面发展？”当然，这个口号是有方向、有界限、有主次的。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用影片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界限，就是不违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原则；主次，就是以现代题材为主，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题材为次，以下类推。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题材、古代题材（如洪秀全、李自成，上推到陈胜、吴广，以及我国历代的促进生产发展、文明进步的英雄人物，如李冰、沈括……等等），再其次是“其他”，这相当于农业十二个字中的“杂”，也就是神话、传说、科学幻想故事之类。这一类题材，看来无关宏旨，但是备此一格，对于教育人民、增加历史知识、提高民族自信心，也是有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设想，通过实践，逐步使之完善，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作出三年、八年、乃至二十二年的长期规划。当然，这只是一个长期脱离实际的“老兵”的不成熟的设想。我这样讲，也只是想说明，题材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对文艺，包括电影作品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作家的立

场、世界观。比如梅花这个题材，陆游和毛主席都写过，就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陆游咏梅，是士大夫阶级怀才不遇的孤愤和哀愁；而毛主席的咏梅，却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胸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同样是写工农兵题材的电影，《风暴》、《槐树庄》、《董存瑞》，是香花；《盛大的节日》、《春苗》、《千秋业》是毒草，也是明显的例子。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强加了一个“反‘题材决定’论”的罪名，纯属诬蔑不实之词。正相反，他们自己倒是炮制了一个荒谬绝伦的“题材决定论”，大搞“阴谋文艺”，强迫作家只写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在着重提倡表现重大题材的同时，也要提倡题材多样化。

问：最后，还有一个提高影片质量，或者说是提高技巧水平的问题。记得在一九六一年你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答：是的，在一九六一年，我写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认为要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平，艺术家必须在思想、生活、技巧这三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毛主席明确地教导我们，要力求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个问题，正如我们过去对思想改造、深入生活等问题抓得不紧一样，要就责备求全，要就放任自流，一直没有做过系统的努力。我在你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说过的我国电影技巧方面的“直、露、多、粗”的四弊，从最近看到的一些新片看来，似乎这些

方面还没有明显的改进。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四弊中的“露”字反而越来越突出了。当时，我曾引用过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的“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之类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后来，“四人帮”的爪牙们却给我扣上了“复古”、“重技巧、轻政治”的罪名。其实，反对“露”，这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例如，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一八八八年，他又在给玛·哈克奈司的信中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中摘引了费尔巴哈的一段话：“随便说说，俏皮的写作手法还在于：它预计到读者也有智慧，它不把一切都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说出这样一些关系、条件和界限，……只有在这些关系、条件和界限都具备时说出来的那句话，才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列宁就在这段话的页边上自己作了批语：“肯切！”应该说，对有一点创作经验的人来说，这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了。可是“四人帮”却认为读者和观众都是傻瓜，没有智慧，自己不能判断，必须作家“把一切都说出来”，所以他们把应该“意会”的事，一律改为“言传”，硬要剧中人把他们的政治主张、解决办法赤裸裸地讲出来，不仅讲出来，而且还要大声地喊出来。所以有些观众开玩笑，把“话剧”叫做“喊剧”，把看电影说成“听报告”、“看吵架”。其实，任何一个人，不论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或者是中间人物，都是有内心活动的，

都是会考虑到具体的条件的，除去在特定的情况下，一般是不把所有的“心里话”都直统统地讲出来的。“四人帮”的手法是绝对化和简单化，批评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唯心主义，据说现在的戏剧学校里，连“内心活动”、“潜台词”这一类话也不准讲了。但是不准讲并不等于人就没有“内心活动”和“潜台词”。就拿“四人帮”来作个例子吧，他们要篡党夺权，要诬陷和迫害周总理和一大批老干部，这些都是他们的“内心活动”，可是他们却从来不会在大庭广众中赤裸裸地把这种阴谋诡计讲出来的。即使在他们写的黑文章里，也是用含沙射影、以古喻今的手法的，甚至在给死党们写的密信中，也是讲得很隐蔽的。除“露”之外，“直”、“多”、“粗”的毛病，也还是相当普遍地存在。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我不多讲了。

最后，还有一句老生常谈：要提高我国电影艺术的质量，最根本的办法是我们全体电影艺术、技术工作者要下定决心，发愤图强，加强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学习科学技术，同时，要花气力提高艺术修养，钻研电影技巧，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使自己成为本行业务的专家。

我是乐观主义者，尽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要整顿、恢复、发展，还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是，我还是坚信，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电影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也一定能三年大见成效的。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电影》一九七八年二、三期）

生活 知识 技巧

——在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象一声春雷，在文艺界打破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首先冲向敌阵的是文艺界的轻骑兵——漫画和曲艺。就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之内，成千上万张专业和业余画家的漫画贴遍全国城乡，威慑敌胆；相声、曲艺通过广播、电视，强烈地嘲讽和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丑恶和凶残；接着，话剧一马当先，成为揭批“四人帮”的主力先锋。一九七七年我们看到了《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转折》，今年，我们又看到了《最后一幕》、《报童》、《丹心谱》、《东进，东进！》；文学界也不落后，我们高兴地在报刊上看到了年逾八旬的茅盾、叶圣陶的文章，古稀之年的巴金、沙汀也焕发了青春。姚雪垠不仅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而且做好了这部长篇完成以后的创作计划。诗人徐迟，别出蹊径，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大批新人的涌现，其中一位中学教师刘心武，写出了短篇小说《班主任》，有些外国评论家把《哥德巴赫猜想》和《班主任》认为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文艺

界最有特色的作品，其特色，在于作家解放了思想，写出了过去很少触及的新的题材。在这些方面，可以说一年初见成效的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艺战线的重武器的电影，由于“四人帮”破坏严重，生产周期较长，现在放映的新影片中，为广大观众欢迎的不多，有几部影片还受到了观众尖锐的批评，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四人帮”肆虐时期写成的文学本，后来经过修补而拍成的，多少还留着帮气的痕迹，但是，电影艺术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李准的《大河奔流》、梁信的《从奴隶到将军》、苏叔阳的《丹心谱》即将拍成电影，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基础较好的电影文学剧本，出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业余作者，如《沧桑大地》的张暖忻、姚蜀平、李陀，《梅岭星火》的黄会林、绍武，《罪人》的王芝瑜、苏立群等等。

这一时期文艺方面的成就中，最值得高兴的，一是新人辈出，其次是思想解放，体裁多样，敢于冲破过去的“禁区”，注意到塑造人物性格，开始清除了过去那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的风气。当然，这一切都还是第一步，还只是初见成效，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障碍，还有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四人帮”的流毒很深，影响很大，还没有彻底清除，不能说我们的作家已经完全心无余悸。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华主席的指示：“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的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从理论、路线、政策、作风等方面，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思想上、题材上、创作方法上还有不少长期以来束缚我们手脚的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框框杠杠。这种清规戒律和框框杠杠是由来已久、“四人帮”肆虐以前已经存在的，对此，我们这些管过文艺工作的人，也